

【农村·农民·农业研究】

冲突应对方式与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

——基于贵州和云南两省的实证调查

彭国胜

(贵州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通过对贵州和云南两省516名农村居民的实证调查,揭示了西南地区农村居民行政冲突中的多元应对方式及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应对“官—民”冲突的方式依次为“协商”“体制内抗争”“逃避”“体制外抗争”。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表现出了较高的信任,且其政府信任程度受冲突应对方式的显著影响。与行政冲突中倾向于“协商”的居民相比,倾向于“逃避”和“体制外抗争”的居民,其政府信任要明显相对更低;倾向于“体制内抗争”的居民,其政府信任则没有显著差异。虽然体制外抗争和逃避对政府信任均具有负面影响,但前者对政府信任的消极影响相对更大,显著性更高。研究表明,加强政府信任建设,有必要引导民众更加理性地应对日益频繁的行政冲突。

关键词:西南地区农村居民;冲突应对方式;政府信任

中图分类号:C913.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3)06-0041-08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工业化、城镇化浪潮的兴起,中国社会正迅速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基于地缘和血缘纽带的特殊性社会交往关系更多地被正式角色之间的普遍性社会交往关系所替代,这就迫切需要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信任模式。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社会信任的本质乃是政府信任,因为政府信任在中国信任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即便是“消费者对商家和厂家的不信任也会传导为对整个社会管理与运行机制的不信任,最终成为指向对政府的不信任”^[1]。

伴随着现代政府职能的重心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政府与民众的接触面扩大,接触点增多,二者之间发生冲突的机会也相应增加。化解体制化社会冲突的能力已成为衡量现代社会某种政治系统具有适应力的重要指标。一个具有适应力的政治

系统允许其公民动用各种冲突应对机制,从而避免弗里德里克·巴洪所谓的“软弱的灵活性”或“原则性缺失”^①对政治稳定的冲击。^[2]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官—民”冲突频发。在此起彼伏的让人匪夷所思乃至心生寒意的袭警、枪击、连环残害幼儿、纵火等缺乏直接利益动机的恶性冲突中,我们不断见证着冲突主体将怨恨向无辜群众转移的悲剧性无奈。网络虚拟空间中“仇官仇富”心态所导致的与主流文化相悖的另类“标签化”盛行其道与网络谣言的“狂欢”,标志着一种把对社会现实的不满转移到网络空间的“电子化仇恨”^[3]的崛起,这无疑对政府信任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此种背景下,对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冲突应对方式及其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的研究,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13-08-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社会资本与西南民族地区和谐发展问题研究”(08XZZ005);贵州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自主招标课题“政治文化与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彭国胜,男,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生,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与民族政治学研究。

① 即非制度化的或违法的利益诉求模式。

二、研究综述

1. 作为一种互动模式的冲突应对方式

作为一种互动模式的冲突应对方式,学界向来以实验室中囚徒困境的研究为主流。此类研究将行动者坦白招认或保持沉默的行为反应,分别当作对冲突情境的竞争性反应或合作性反应,并建构了一系列与竞争或合作行为有关的影响因素与互动模式。后来,霍尔直接将囚徒困境中的竞争性反应转化为追求个人目标的向度,合作性反应转化为考虑人际关系的向度,并据此建构出战斗型、友善型、退缩型、整合型和妥协型五种冲突应对模式。^[4]

目前,国外关于中国民众体制内冲突应对方式的研究主要围绕法律模式和“笼罩着法律的影子”^①的非法律模式两条轴线展开。^[1]在非法律模式研究上,国外学界对调解这一具有东亚特色的冲突应对方式表现出了较大的理论兴趣,且存在“文化决定论”和“结构差异论”的分歧。文化决定论认为,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是全世界最倾向于使用调解来应对冲突的国家。^[5]结构差异论则指出,调解作为中国人最普遍的冲突应对方式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它与暴力、集体行动和胁迫性自杀^②等方式一样,只不过是众多冲突应对方式中的一种而已,且在地区、阶层等社会结构变量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6]

在国内,相关研究大多侧重于从底层视角出发,分析探讨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民)身临冲突情境中的各种抗争性应对行动,并形成了三种基本的理论框架,即以李连江和欧博文为代表的“依法抗争”框架和以于建嵘为代表的“以法抗争”框架,还有“依情理抗争”的分析框架。^[7-9]经验研究表明,中国农民目前的集体抗争行动主要有三类方式:集体上访、集团诉讼和就地抗争。^[10]其中,集体上访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胡荣对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流失的分析、^[11]田先红对“上访专业户”从“维权型上访”到“谋利型上访”蜕变的研究^[12]和陈柏峰对上访的分类治理的探讨^[13]等。事实上,对上访这种冲突应对方式的探讨远远超越了上访行为本身,进而发展到对信访的制度合法性的争论,其理论分歧可概括为“强化论”与“废弃论”的交锋。^③此外,亦有个别学者区分了农村居民的一般冲突和严重冲突,并探讨了产生冲突之后的几种主要解决途径:属于私人领域的

社会网络和属于公共领域的政府部门和司法机构。^[14]

2. 作为一种政治信任的政府信任

以中国为对象的政治信任研究大致可归为两类:比较政治学视野中的国别(或地区)政治信任研究和乡村治理视野中的中国农民的政治信任研究。前者较有代表性的如史天建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比较研究^[15]、马得勇对亚洲8国^[16]和世界69国的比较研究^[17]等。后者往往聚焦于农民上访、村民选举等乡村治理中的现实问题来分析探讨中国农民的政治信任。^[11,18]

在政府信任的现状上,现有的经验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混合的图景:根据史天健等学者的调查,从1993年至2003年之间,中国民众的政府信任程度呈江河日下之势;^[19]而肖唐镖等的研究显示,从1999年至2008年,中国农民的政府信任逐渐提升。^[18]在政府信任的结构上,现有研究则达致了较有普遍性的共识:中国民众的政府信任随着从中央到基层的层级变化而呈现出逐渐减弱的现象。^[20]

3. 冲突应对方式与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作为一种国家行政情境下的权威信任形式,包含着民众对政府的基本理解和情感取向,反映着民众对政治权威或政治机构是否按照期望运作的评价。个体的态度与评价植根于其生活境遇,并随生活境遇的改变而变化。从社会互动论的此种观点来看,不同的冲突应对方式形塑着冲突主体差异化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平感,进而会影响其对政府的认知、理解与评价。

冲突应对方式与农村居民政府信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获得了国内现有的经验研究的支持。胡荣关于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的研究结果显示,上访对农民政治信任的流失具有很大影响:上访者到达政府层次每提高一级,其对政府的信任就减少一个档次。^[11]谢治菊对村民政治参与及其对基层政治信任的影响的研究表明,村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对基层政治信任有正向的影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却是负向的。^[21]

综观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国农村民众的冲突应

① 体制内的非法律模式如调解、信访等一般受到法律或行政规则的调控。

② 为达某种目的以自杀相威胁。

③ 虽然新《信访条例》的出台从实践上为这一争论划上了句号,但理论上的分歧并未消除。

对方式及其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虽然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学术关注,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从研究视角来看,相关研究大多属于对某种具体的冲突应对方式(如调解、信访、集体行为、诉讼)的个别探讨,鲜有对冲突应对方式的综合分析。在研究内容上,抗争性冲突应对方式关注较多而协商性和妥协性冲突应对方式关注较少。可见,探讨西南地区农村居民冲突应对方式的多元样态及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尚有较大的学术开拓空间。

三、研究设计

1. 资料来源与样本状况

(1) 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08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社会资本与西南民族地区和谐发展问题研究”的问卷调查。此次调查的抽样范围为贵州和云南两省农村地区的成年居民,所有样本均系随机抽样所得。抽样具体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采用多段抽样方法,先从贵州和云南省现有的民族自治市(州、地)中按照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各抽取几个民族自治县(市、区),再从每个样本县(市、区)中,随机抽取几个街道办事处(或社区服务中心)和乡镇,再从每个街道(或社区)和乡镇中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居民家庭;第二步采用的是Kish户内抽样方法,从以上获得的民族地区城乡居民家庭中各随机抽取1名在家的成年人作为访问对象,最终获得的实访对象即为此次问卷调查样本。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120份,收回有效问卷999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9.2%。其中,农村居民有效样本516份,本研究的数据资料即来源于此。

(2) 样本状况

在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地位上,调查样本性别上男性(62.1%)居多,以少数民族(89.2%)为主,绝大多数为已婚(81.2%),非党员(89.4%)为主。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占75.8%,其中2000元以下的42.6%。调查对象表现出文化程度偏低(高中以上的仅占13.75%)、人口老龄化明显(60岁以上者占13.2%)、阶层认同趋于底层化(自评地位为中下层及以下的达62.7%)等特征。

2. 概念的界定与操作化

(1) 因变量: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
作为一种狭义上的政治信任,政府信任即公民

对政府的信任,是公民由于对政府的依赖和信心而授予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某些利益问题的自由决定权,同时也接受了这种因授权所可能造成的伤害的风险。^[22]政府信任包括对政府机构的信任、政府公务人员的信任、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信任。^[23]本研究主要探讨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基层政府信任,在政府信任的测量上,除了机构、公务人员和公共服务三个维度之外,本研究还引入了政府权威认同维度。上述维度具体操作化为“您相信您现在所居住地区的乡镇党委、政府吗”“您相信乡镇党委、政府派到你们村的驻村干部吗”“您相信乡镇党委、政府在公共政策(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执行过程中,会真心实意地关心农民?”“您认为当前乡镇党委、政府在农村的威信如何”等四个问题。前三个问题的答案为“很相信、比较相信、一般、不太相信和很不相信”,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包括“很高、较高、一般、较低、很低”,分别赋以5~1分。

(2) 自变量: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冲突应对方式

农村居民的冲突应对方式是指农村居民身临冲突情境中的各种应对行动。冲突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它可以是个人内在的冲突,或是人际间的冲突,或是群体间的冲突。^[4]本研究中的冲突特指农村居民与政府机关(或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的行政冲突,亦即传统的“官—民冲突”。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农村居民的冲突应对方式主要包括逃避性应对(如忍让、回避问题等)、协商性应对(包括调解、协商等)与抗争性应对(分出是非曲直和胜负,如诉讼、集体行为等)等三种类型。其中,抗争性应对方式又可以区分为体制内抗争性应对方式(如上访、诉讼、行政复议)和体制外抗争性应对(如依靠自身暴力)。

此外,本研究还引入了两类控制变量:其一是人口特征变量:年龄、性别、民族、文化程度;其二是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政治面貌、职业、家庭年收入、相对社会地位。

四、结果与分析

1. 西南地区农村居民冲突应对方式与政府信任的基本现状

(1) 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冲突应对方式
在“当您因利益问题与政府机关发生纠纷,会

首先选择下列哪种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上,调查对象的选择依次为“找该机关的领导”(33.5%)、“忍气吞声”(19.4%)、“找熟人帮忙”(17.2%)、“到有关部门信访”(13.4%)、“依靠自身强力解决”(7.6%)、“借助媒体的力量”(3.5%)、“申请行政复议”(3.3%)以及“提起行政诉讼”(2.1%)。

表 1 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冲突应对方式

冲突应对方式	频数	百分比
找该机关的领导	173	33.5
忍气吞声	100	19.4
找熟人帮忙	89	17.2
到有关部门信访	69	13.4
依靠自身强力解决	39	7.6
借助媒体力量	18	3.5
申请行政复议	17	3.3
提起行政诉讼	11	2.1
合计	516	100.0

上述八种冲突应对方式中,“找该机关的领导”具有谈判、磋商的意义;“找熟人帮忙”则是积极寻求第三者的介入和调解,因而都可以归为协商性冲突应对方式;“忍气吞声”意味着消极逃避,乃是一种逃避性冲突应对方式;“到有关部门信访”^①“借助媒体的力量”“申请行政复议”以及“提起行政诉讼”都带有抗争的性质,且这些方式都是体制内所容许或提倡的,因而可称为体制内抗争性冲突应对方式;“依靠自身强力解决”也明显带有抗争的性质,但可能不合法,因而是一种体制外抗争性冲突应对方式。根据表 2 可见,在“官—民”冲突情境中,西南地区农村居民所采取的冲突应对方式类型依次为“协商”(50.7%)、“体制内抗争”(22.3%)、“逃避”(19.4%)以及“体制外抗争”(7.6%)。

表 2 西南地区农村居民冲突应对方式归类

冲突应对方式类别	频数	百分比
逃避性冲突应对方式	100	19.4
协商性冲突应对方式	262	50.7
体制内抗争性冲突应对方式	114	22.3
体制外抗争性冲突应对方式	39	7.6
合计	516	100.0

(2)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

从表 3 可知,西南地区农村居民表现出了较高的政府信任,在政府机构信任、政府公务人员信任、政府公共服务信任和政府权威认同等四个政府信任指标上,其平均得分分别为 3.41、3.35、3.30 和 3.47,其在四个政府信任指标上的总均分为 3.38,均高于中分点(3.0)。

表 3 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

因变量	指标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政府信任	政府机构信任	1	5	3.41	1.18
	政府公务人员信任	1	5	3.35	0.98
	政府公共服务信任	1	5	3.30	0.99
	政府权威认同	1	5	3.47	1.07

2. 冲突应对方式与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

根据表 4 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发现。

表 4 以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为因变量建立的回归分析模型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显著度	t 值
人口特征			
性别	-0.029	0.612	-0.508
民族	-0.098	0.078	-1.771
年龄	-0.151	0.020	-2.183
文化程度	0.071	0.414	0.818
社会经济地位			
政治面貌	0.131	0.029	1.974
职业	0.155	0.022	2.297
家庭年收入	0.122	0.035	2.187
相对社会地位	0.160	0.012	2.542
冲突应对方式			
逃避性应对	-0.119	0.043	-1.988
体制内抗争性应对	0.049	0.400	0.843
体制外抗争性应对	-0.174	0.003	-3.006
N	516		
Adjusted R square	0.110		
F	2.489		

注:a.被解释变量为政府信任四个维度上的总均分;b.参照类:冲突应对方式=协商性应对;性别=女;民族=少数民族;政治面貌=非党员;职业=未任过乡村管理者。

(1)人口特征变量中,性别和文化程度对西南地区农村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缺乏统计显著性;民族身份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具有微弱的显著性,与少数民族居民相比,汉族居民的政府信任相对稍低;年龄与政府信任呈显著的负相关,年龄越大,政府信任越低。

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男女两性的政府信任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上,女性明显高于男性。^[11]相关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高与更高的政治信任度相关”^[24],受教育程度低则与失范和政治疏离相联系。^[25]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对政府信任的此种影响,在本研究中没有得到检验。

国外的研究结果发现,种族等身份类属与政治信任密切相关。弱势族群更容易与政治疏离发生

① 包括私下威胁、报复、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等体制外行为。

联系。与白人相比,美国的黑人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明显更低。^[26]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少数民族居民的政府信任甚至稍高于主体民族(汉族)居民的政府信任,这可能与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地区的成功实践有关。

(2)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中,政治面貌、职业、家庭年收入和相对社会地位对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党员的政府信任要明显高于非党员;担任过乡村管理者的居民,其政府信任要明显高于未担任过乡村管理者;家庭年收入和相对社会地位与政府信任之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居民的家庭年收入和相对社会地位越高,其政府信任也就越高。与家庭年收入这一绝对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相比,相对社会地位这一指标不仅回归系数大于前者,而且显著度也高于前者,这表明,相对社会地位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要大于绝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的农村,党员和乡村管理者的身份依然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以往的研究也发现,党员身份和是否担任过村组干部对农村居民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具有明显的影响。^[27]本研究的结果再次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两个变量对农村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依然具有显著性。

以往的经验研究显示,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较低的社会地位更可能导致失范和政治疏离。^[25]在不同的阶层中,对政府及其政策最为不满的当数那些低收入人群。^[28]改善人们对经济状况的评价乃是增进公众政府信任的有效举措。^[29]本研究的结果既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对政府信任的此种影响,同时也进一步表明,相对社会经济地位比绝对社会经济地位更能影响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这意味着加强政府信任建设,不仅需要改善民众的客观经济状况,还需要注重民众主观地位认同的提升。

(3)冲突应对方式对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施加着显著的影响。与身临“官—民”冲突情境时倾向于选择协商性冲突应对方式的居民相比,倾向于选择逃避性冲突应对方式和体制外抗争性冲突应对方式的居民,其政府信任要明显相对更低;倾向于采用体制内抗争性冲突应对方式的居民,其政府信任则与采用协商性冲突应对方式者没有显著差异。从回归系数和显著度来看,虽然体制外抗争性冲突应对方式和逃避性冲突应对方式对政府信任均具有负面的影响,但前者对政府信任的

消极影响相对更大,显著性更高。

协商性冲突应对方式的基本特点是折中妥协,面对冲突的实质性争议,“双方各退让一步”,以相互妥协的方式化解冲突。双方虽因退让而有所亏损,却也都有所斩获。此种方式在现实中通常由第三者权充“中间人”“仲裁者”“调解者”。第三者并非扮演裁判或法官的角色来论断孰是孰非,而是以不伤和气为原则的“和事佬”。其基本模式是,首先,调解者提醒当事人争讼的恶果,并要求当事人停止攻击或争执,以免事态扩大。接着,请当事人的双方给调解者一个“面子”或“人情”,各退让一步以达成协议。如果调解者的权威够大,要求给面子或人情是不用说出口的,而是当事者该有的社会共识。虽然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总是期待能“讨一个公道”,但最后往往碍于调解者的面子或不想截断人情网络而让步妥协。而且,调解者的存在也等于给当事者下台的阶梯。最后,调解者再给当事人以一些“心理安慰”与“精神胜利”,于是“大事说小、小事说了”,冲突也就告一段落。^[4]协商性冲突应对方式建立在“诉诸中庸”的思维上,以“和谐”为优势目标,再配合面子与人情的运作而深烙着文化图像。这一方式不但可以有效地化解冲突,而且能使当事双方都“虽不满意,但可以接受”,因而成为中国社会最盛行,也最受中国人赞许的方式,帝制中国更将此以折中妥协为主的仲裁法加以体制化。^[30]党的十八大也提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相结合的“大调解”的冲突应对理念与策略,此种理念与策略扎根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也合乎中国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的基本现实逻辑,对于维护政治稳定、增强政治信任、增进社会和谐无疑将会是大有裨益的。

黄光国的研究指出,中国人处理冲突时倾向于采取忍耐的方式,并因而容易产生心理困扰症状。^[31]逃避性冲突应对方式的固有特征决定了其对政府信任会具有负面影响。逃避性冲突应对方式的最大特征是忍让。在《说文》中,忍和让都是形声字,前者指心上插刀,意味着“忍”本身是一种不自然的矫揉心性或是不舒服的、痛苦的经验,后者则含有“任凭之”“允许之”“把自己的东西给人”之意。因此,忍让基本上是一种于己不利、牺牲委屈自我而成全对方的方法。作为一种自我压抑式的冲突应对机制,忍让通常是在面对强势或固执不通的对手或烦琐难解的争端时,不得不采取的无奈之举。由于多属非自愿的被动式的决定,故有

强行抑制或受迫于他人、情势之苦。^[4]此种苦相当难耐,也受个人挫折承受力的限制。一旦“己方愈让,对方愈旺”,忍让者将更倍感“软土深耕”的卑微、不受尊重与屈辱。持续忍让的结果无外乎二:向内演变为心因性疾病,或对外失去信任并在无望中引爆报复性反弹。逃避性冲突应对方式另一个特征是消极抵制。在斯科特著名的关于马来西亚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研究中,逃避乃是一种低姿态的反抗技术——一种避免公开反抗风险的“弱者的武器”^[32]。伊万·塞勒尼在探讨内生过程在东欧社会主义体制崩溃中所发挥的作用的经验研究中揭示了此类“弱者的武器”在结构性变迁中的巨大威力:草根阶层的“沉默的抵抗”虽小但叠加起来却能极大地消耗整个体制。^[33]

抗争是一种为争取己方利益或维护己方立场,不断声张自己的主张或权益,并不惜削弱、抨击对方的冲突应对方式。使用抗争方式的冲突主体往往视双方的关系为零和关系,并以此为竞争、好胜的合理化理由,这就造成为不让自己落入“输”的境地,以失去尊严或基本权益,而不得不起而抗争的紧张性。为什么体制内抗争性冲突应对方式与体制外抗争性冲突应对方式对政府信任会施加不同的影响?这是因为,体制内抗争乃是一种在现有规范框架内的“据理力争”,此类抗争行为的目的在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或争取自认该得的权益,而不一定要伤害或毁损对方。一般来说,体制内抗争具有比较明确的问题焦点和较为清晰的利益目标,且冲突主体对现有的规则框架和组织机构抱持着某种信念和信心。体制外抗争则是一种超出现有规范框架的“玉石俱焚”,此类抗争行为的目的在于以消极的方式(牺牲自己的需求或利益)来干扰、阻止、伤害或毁损对方,使其不得遂行其愿,因而往往会最终沦入“为冲突而冲突”的“非现实冲突”之中而模糊初始的问题焦点,成为仅仅为了宣泄敌对情绪的“虚性冲突”。此类行动通常发生在当冲突主体发现体制内抗争无望获胜,对现有的规则框架和组织机构彻底丧失信心、对冲突前景彻底绝望之际,且经常体现为“两败俱伤”式的暴力攻击行为。

五、结论与讨论

根据对贵州和云南两省516名农村居民的实证调查,可以获得如下结论。

(1)身临“官—民”冲突情境时,西南地区农村居民所采取的冲突应对方式类型依次为“协商”“体制内抗争”“逃避”“体制外抗争”。

(2)西南地区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具有较高的信任。统计结果发现,西南地区农村居民在政府机构信任、政府公务人员信任、政府公共服务信任和政府权威认同等四个指标上的单项平均得分和总均分均高于中分点,表现出了较高程度的政府信任。

(3)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受社会经济地位和冲突应对方式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民族身份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具有微弱的显著性;年龄与政府信任呈显著的负相关。政治面貌、职业、家庭经济收入和相对社会地位对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党员的政府信任要明显高于非党员;担任过乡村管理者的居民,其政府信任要明显高于未担任过乡村管理者;家庭年收入和相对社会地位与政府信任之间均呈显著的正相关,且相对社会地位对民族地区农村居民政府信任的影响要大于绝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冲突应对方式对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施加着显著的影响。与身临“官—民”冲突情境时倾向于选择协商性冲突应对方式的居民相比,倾向于选择逃避性冲突应对方式和体制外抗争性冲突应对方式的居民,其政府信任要明显相对更低。体制外抗争性冲突应对方式和逃避性冲突应对方式对政府信任均具有负面的影响,且前者对政府信任的消极影响相对更大且更为显著。

在全球化加速推进和文化多元化趋势强劲崛起的当代社会,政府信任下降已成为一种国际间的共同现象。尼指出,当前最大的治理危机在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有江河日下的趋势,其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不止在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许多西欧国家如英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34]东亚的日本也陷入了长期的低度政府信任困境。即便北欧的挪威和瑞典等公共服务已经相当完备的福利型国家,政府信任也呈持续下降之势。^[35]

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强化农村民众的政治信任尤为重要。农村民众的政府信任是维系地区社会稳定、推动地区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在相对欠发达的西南农村地区,实现现代化的理性选择,就是把政治作为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推动力,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主导型道路,

这就必须强化西南农村地区民众的政府信任。

本研究所获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政府信任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且相对社会地位对政府信任的影响要大于绝对社会地位。因此,加强政府信任建设,既需要注重改善民众的客观经济状况,提升其绝对社会经济地位,也需要注重提升民众以主观阶层认同状态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社会经济地位。

在控制了其它变量的影响之后,冲突应对方式对西南地区农村居民的政府信任依然具有显著的影响——相对于行政冲突中倾向于协商的居民而言,倾向于体制内抗争的居民,其政府信任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倾向于逃避和体制外抗争的居民,其政府信任则要明显相对更低。虽然体制外抗争和逃避对政府信任均具有负面的影响,但前者对政府信任的消极影响相对更大,显著性更高。这一结果表明,引导民众更加理性地应对日益频繁的行政冲突,预防与削减危及其政治信任的体制外冲突应对方式,是加强政府信任建设的有效举措。

参考文献:

- [1] 朱虹. 信任危机与中国体验[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2(5): 66-68.
- [2] Yongshun Cai. Social Conflicts and Modes of Action in China[J]. *The China Journal*, 2008(59): 89-109.
- [3] 王海洲. 想象的报复: 西方政治学视野中的怨恨[J].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7(6): 38-47.
- [4] 黄丽莉. 华人人际和谐与冲突: 本土化的理论与研究[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5-6.
- [5] Wall, James, Michael Blum. Community medi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91(35): 3-20.
- [6] Neil J Diamant. Conflict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in China: Beyond Mediation-Centered Approaches[J].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00(44): 523-546.
- [7] 李连江, 欧博文. 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M]. 香港: 太平洋世纪研究所, 1997.
- [8] 于建嵘. 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J]. 社会学研究, 2004(2): 49-55.
- [9] 罗亚娟. 依情理抗争: 农民抗争行为的乡土性——基于苏北若干村庄农民环境抗争的经验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2): 26-33.
- [10] 应星. 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7(2): 1-23.
- [11] 胡荣. 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J]. 社会学研究, 2007(5): 39-55.
- [12] 田先红. 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J]. 开放时代, 2010(6): 24-38.
- [13] 陈柏峰. 农民上访的分类治理研究[J]. 政治学研究, 2012(1): 28-42.
- [14] 郭星华, 王平. 中国农村的纠纷与解决途径[J]. 江苏社会科学, 2004(2): 71-77.
- [15] Tianjian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J]. *Comparative Politics*, 2001(4): 401-419.
- [16] 马得勇. 政治信任及其起源: 对亚洲 8 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7(5): 79-86.
- [17] 马得勇, 王正绪. 社会资本、民主发展与政府治理: 对 69 个国家的比较研究[J]. 开放时代, 2009(5): 70-83.
- [18] 肖唐镖, 王欣. 农民政治信任变化的影响因素——对五省市 60 个村的跟踪调查和研究(1999—2008)(初稿)[M]. “当代中国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论坛论文集, 长春: 中国政治学会, 2010: 31-41.
- [19] 史天健, 史杰. Political Tru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tinuity and Change, 1993-2002[M]. 重庆: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和谐社会建设与危机管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7.
- [20] 沈士光. 论政治信任——改革开放前后比较的视角[J]. 学习与探索, 2010(2): 60-65.
- [21] 谢治菊. 西部地区农民对农村社会的风险感知与行为选择[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4): 12-21.
- [22] 马克 E 沃伦. 民主与信任[M]. 吴辉,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4: 290.
- [23] 姜晓秋、陈德权. 公共管理视角下政府信任及其理论研究[J]. 社会科学辑刊, 2006(4): 41-44.
- [24] Agger Robert E, Marshall N. Goldstein & Stanley A. Pearl. Political Cynicism: Measurement and Meaning[J]. *Journal of Politics*, 1961(23): 484.
- [25] McDill, Edward L, Jeanne Clare Ridley. Status, Anomie, Political Alien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62(68).
- [26] Aberbach, Joel D, Jack L Walker. Political Trust and Racial Ideology[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70(64).
- [27] 胡荣. 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J]. 社会学研究, 2006(2): 61-85.
- [28] Lineberry Robert L, Ira Sharkansky. Urban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 [29] Citrin Jack, Donald Philp Green.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the Resurgence of Trust in Government[J].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86(16).

- [30] Hsiao, Kung-Chuan. *Compromise in Imperial China. Seat-tle* [M].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9.
- [31] Hwang, K. K. The dynamic process of coping with interpersonal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ety[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1977(2):198-208.
- [32] 詹姆斯·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M]. 郑广怀, 等, 译.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07.
- [33] 伊万·塞勒尼. 新古典社会学的想象力[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333-334.
- [34] J. S., Zelikow P D, King D C.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Cambridge* [M].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8.
- [35] Alex Inkeles. *Stability and Social Change* [M].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136.

(责任编辑: 李良木)

Modes of Conflict-resolution and Rural Residents' Government Trust in Southwest China: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 Guizhou and Yunnan Provinces

PENG Guosheng

(Marx' Theory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 Center,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 By investigating 516 rural residents in Guizhou and Yunnan provinces, the study revealed the rural residents' multiple modes of administrative conflict-resolution and their effect on government trust in the southwest China.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ural residents coped with the "official-civil" conflict by successively "consulting", "institutionally resisting", "escaping" and "uninstitutionally resisting", and their trust in grass-roots governments displayed a high degree and wa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modes of conflict-resolution. Compared with the residents who tended to consult when faced with administrative conflict, the ones who tended to escape or uninstitutionally resist showed significantly lower trust in governments, while the others who tended to institutionally resist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ir trust in governments. Although either institutional resistance or escape has negative effect on government trust,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former was relatively larger and significantly higher. The results also showed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guide the public in coping with the increasingly frequent administrative conflicts more rationally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overnment trust.

Key words: Rural Residents of Southwest China; Conflict-resolution Modes; Government Trust